

# 國共兩黨之外： 曾琦及其《國體與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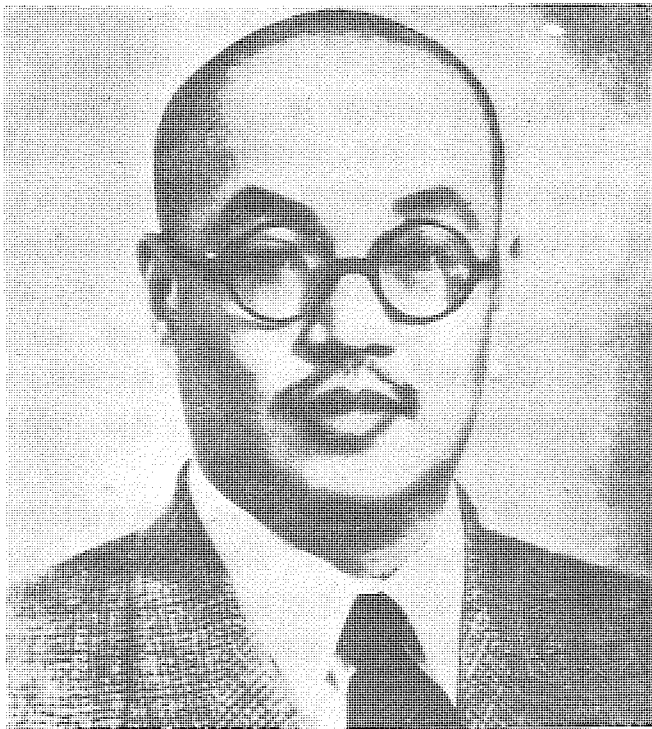
● 李金強

由孫中山及其繼承者所領導之國民黨，以及崛興於20年代初期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青年黨，均以民族主義號召國人，從事抵禦外侮，以及謀求國家之現代化，進而達成建國(nation-building)之心願。國、共兩黨憑藉民族主義取得政權和確立兩黨在中國現代史上之地位，學者論述頗多，唯獨對被視為「第三政治勢力」之中國青年黨，注意尚嫌不足。就中國青年黨之創建而言，實為五四新一代知識青年目睹時艱，激於愛國義憤毅然投身救國運動此一背景而起，此即該黨素以「國家主義」相號召之因由，故此探討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形成，該黨及其領袖，實為不可忽略之一環。

國、共兩黨憑藉民族主義取得政權和確立兩黨在中國現代史上之地位，學者論述頗多，唯獨對被視為「第三政治勢力」之中國青年黨，注意尚嫌不足。

## 曾琦創立「第三勢力」之始末

該黨之創黨者及黨魁曾琦(1892-1951)，字慕韓，四川隆昌人，出身於仕宦之家。辛亥革命前夕，由於清廷推動新政，四川一省新式學堂紛紛建立，湧現一批新知識分子，曾氏即為其一，並參加重慶光復之役。辛亥革命後，更出現民主共和新氣象，如開放輿論，報刊叢起，如進行國會議員(省議會及眾議會)之選舉。曾氏即在此一政治氣候轉變下，於1912年創辦《民國新報》及《群報》，投身新聞事業。可惜其辦報與從政均未見成功<sup>①</sup>，遂重返成都法政學堂繼續學業。1913年，由於宋教仁被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曾琦再赴重慶，參加熊克武及楊庶堪等反袁運動，然終為親袁川督胡景伊所敗，曾琦潛返故居<sup>②</sup>，因胡景伊對革命黨人進行殘酷鎮壓，遂由其次兄昭祺資助，預備留學法國。然而，歐戰爆發，曾琦改於1914年入讀上海震旦學院，習法文，與左舜生(1893-1969)、李璜(1895-1991)等同窗，種下曾、左、李三人創建與領導中國青年黨之同志關係。由此可見曾氏於辛亥革命前後，受到清末革命風潮之刺



曾琦五十歲時攝。

激，投身辛亥光復活動及二次革命，並且經營報業，參加民初國會議員初選等政治活動：在革命時代風潮之影響下，關心國事，終於在其青年期孕育出愛國、救國情懷，遂使其置身於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者之行列，並在民初日本侵華的背景下，確立其民族主義之思想體系。

曾琦對於日本無端以二十一條約強加於中國一事十分憤慨，視此為「奇恥大辱」。1916年，因為時局動盪，他已經無心讀書，並且在震旦成績亦不佳，而赴法留學，又因歐戰延長而不果，終於決定轉赴日本留學，「要去日本研究倭寇對我的野心內容如何，以便喚醒國人早為之備」<sup>③</sup>。是年夏，曾琦赴日，先於東京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文，秋後進入中央大學研習憲法及行政法，與此同時，「崇陸王之學以治心，又採曾胡之說淑世，並讀畢《曾文正公全集》」<sup>④</sup>。在陸、王思想影響下，曾氏着重實踐，力求成為一名不尚空言之行動家<sup>⑤</sup>。對於當時時局及日本侵華之野心，他情緒日形激憤，說：「黎段交惡，政變迭興……求學心思為之不寧，西望祖國，彌切悲懷，蓋身居仇國，目擊彼虜朝野上下謀我之迫切……。」<sup>⑥</sup>1918年初，他與其他留日學生合組「華瀛通訊社」，報導日本政情及揭發日閥之陰謀。同年，由於段祺瑞與日方密簽「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一事為新聞界所披露，東京留學界深感日人亡我之危機，群起反對以及排日，並於5月5日組織「救國團」，決定集體罷學回國。曾氏積極參加這個運動，成為籌組「救國團」及倡導回國之重要學生領袖之一<sup>⑦</sup>。是年6月，曾琦抵達天津，旋投入京津滬三地學生運動中，並成為活躍分子。其活動主要包括下列三方面：

其一，曾氏於參加留日學生罷學歸國之初，已提出歸國後應以「學生聯絡學生」的「串聯」主張<sup>⑧</sup>，倡導學生力量之聯合。曾氏聯同友好終於促成五四前夕京、津、滬地區著名愛國學生團體之出現，包括有由中國留日學生於津、滬

曾氏對於梁啟超及章炳麟兩位最為敬佩，這在於他們談政治或革命的方面，不在於學術。曾氏對於梁、章之景仰，使其自許繼續近代兩大愛國先驅的志業。

成立之「救國團」(1918)，並於各省次第成立支部，於北京則成立「少年中國學會」(1918.6.13)，於上海成立全國性學生組織——「學生救國會」(1918.10.10)。上述社團，分別以抵制日貨，出版書、報、刊，促進國人反日愛國救國之心志<sup>⑨</sup>。可惜成效不彰，國人麻木如故，曾氏憤而南下上海，參加上海救國團所辦《救國日報》之新聞工作，繼續文字宣傳，稍後寫成《國體與青年》一書，並由「少年中國學會」代為出版。該書為曾氏其時之愛國、救國言論代表作。

其二，曾氏對於梁啟超及章炳麟兩位最為敬佩，梁、章二位，同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重要鼓吹者<sup>⑩</sup>。據左舜生觀察，曾琦崇拜梁、章，乃在於他們談政治或革命的方面，不在於學術<sup>⑪</sup>。其時，曾琦認為國家重責在於青年，且望梁、章二人發表著述指導青年<sup>⑫</sup>。曾氏對於梁、章之景仰，使其自許繼續近代兩大愛國先驅的志業。

其三，五四運動勃興之際，曾氏其間正患病，聞訊竟霍然而癒，並立即以《救國日報》記者身分，隻身由滬北上京華，活躍於學界，力主學生繼續四出遊行示威及演講宣傳之活動，為五四學運之「激進派」，對於稍後之「六三事件」，無形中扮演了推波助瀾之角色。顯然，曾琦在五四愛國運動史上應具有一席之地。

## 《國體與青年》之剖析

曾琦指出，辛亥革命七年後中國之亂局，主要由於國民中三十歲以上皆染有專制餘毒，五十歲以上前輩，則有腐敗之舊頭腦，抗拒世界潮流。故此中老年皆不足恃，而國家興亡之重責當由現時已覺悟之青年擔當。

自返國以來，曾氏除了於天津發放排日日文告，痛論親日之危險外<sup>⑬</sup>，並於上海《救國日報》發表愛國救國之言論，希望藉着文字，喚起青年愛國熱誠，以身許國。1918年8月22日起，曾氏於該報撰寫〈中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長文，寫作時，曾參考德富蘇峰之〈大正之青年與帝國之前途〉(1916)一文體裁。德富文「盛誇其萬世一系之帝制，又論日本民族之使命，大倡所謂亞細亞主義以激勵其青年」。而曾氏之文先後連載一月，並引起關心國事讀者之回響，包括青年會徐受謙及留日學生田漢，後者並且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翌年一月，該書由王光祁出資印刷成書，易名為《國體與青年》，作為「少年中國叢書」第一種，並由北大校長蔡元培題簽，胡適、陶恭履、魏嗣鑾、林傳甲及郭惜陰等人寫序，再由李大釗、周太玄、王光祁、陳愚生等人寫跋。及至五四北京學運興起，該書更成為北京學生街頭推銷國貨活動之出售物品，並藉此普及<sup>⑭</sup>。由此可見《國體與青年》一書，在五四運動時具有其一定之影響力。然而近人治五四運動史，對於該書並未給予充分注目<sup>⑮</sup>，故值探討。

該書共分上、下兩編，上編題為「青年」，下編則為「國體」。全書長數萬言，其內容乃痛陳國體動搖，外患緊迫，革命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以及當前國勢的危險，寄望全國青年激發熱誠，共謀國事的補救。曾氏愛國思想與民族主義觀點由該書可見者共分三方面：

### (一) 國家興亡責在青年

曾琦於該書弁言中，開宗明義指出，辛亥革命七年後中國之亂局，乃由於

國人對於共和政體未能充分認識及實踐，而其原因主要由於國民中三十歲以上皆染有專制餘毒，且三十歲以上前輩，以皮毛新知，盡謀個人私利，五十歲以上前輩，則有腐敗之舊頭腦，抗拒世界潮流。故此中老年皆不足恃，而國家興亡之重責當由現時已覺悟之青年擔當，而此輩青年必須具有技能修養與精神修養始能勝任，而後者尤重於前者。所謂精神修養，包括正觀念、立志趣及鍊精神三方面。正觀念者認為青年宜以張載〈西銘〉及文天祥〈正氣歌〉培育具有「民胞物與」、「道德氣節」之人生觀。立志趣者，認為應效法曾國藩立大志，則欲行其道於天下；立小志，則欲寡過於吾身，行其道於家族。鍊精神者，主要包括四點，其一，宜去靜主動；其二，變消極為積極；其三，堅忍精神；其四，犧牲精神。有精神修養而後求豐富之知識以輔之，綜觀曾氏對於精神培養仍以傳統儒家思想為本，認為有道德修養方能肩負重任。

最後，曾氏認為具備德、智之覺悟青年對於國家及世界均須負有責任。國內責任是結合同志組織「中堅團體」，盡其對國民指導重任，藉以達致建國之目標；而國外責任則是提攜亞洲各國民族建立共和政體，對於日本其時高唱「大亞細亞主義」，他認為乃出於侵略之野心，不足領導群倫。故此新中國青年應該有提攜近鄰各邦如朝鮮、安南、暹羅、印度等共建「亞洲大共和國」，同享和平之幸福的理想。

## （二）建國方向肯定共和

曾氏首從歷史、文化、民族角度肯定共和國體適合我國。就歷史而言，曾氏盛讚徐錫麟、趙聲、吳祿貞，宋教仁、黃興及蔡鍔六人具有「憂國之誠意……謀國之苦心……建國之遠謨」，為革命犧牲，而使共和得以建基。就文化而言，先民早富共和思想，唐虞之世，制度類似共和，孔孟學說，素主民本，直至近日西方民主學說入傳，始克完成，得建共和國體。就民族而言，一方面抨擊日人研究我國國民性而專露吾國之短，目的在於侵華，另一方面則提出吾國國民性之優點在於崇尚人道、篤守和平，最為適合共和國體。

最後，曾氏更從進化原理、世界潮流，肯定共和國體，明示我國無由放棄。曾氏之民主政治信念，至為堅實不拔，由此可見曾氏之民族主義流露民族、民主思想共榮共生之觀點，難怪日後中國青年黨之宗旨乃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則。

## （三）國恥增加 主權日喪

他痛感吾國國家觀念之不足，遂羅列鴉片戰爭、圓明園被焚、膠州灣被佔領、義和團戰爭，以至甲午戰爭以及民四「五七」等國恥，並指出甲午一戰，不但是中日國勢之扭轉，更是「我國有史以來未有之奇恥」。顯然，曾氏希望以國恥史例強化吾國青年之國家觀念。其次，曾氏指出吾國國勢危殆，原因乃喪失主權，包括領事裁判權、海關徵稅權及領土主權，這是由於列強以「勢力範圍」方式預佔我國領土，並提出中國之國際地位乃屬一「不完全獨立之國家」。曾氏對於當時我國國家地位之觀察與孫中山「次殖民地」之論點如出一轍，甚值吾人注視。他還認為中華民族過去以文化賓服四鄰以及崇尚和平之歷史，對於人類

未來世界和平及文明之促進，當責無旁貸，傳統中國民胞物與，世界大同精神，顯露無遺！

## 「五四型」的民族主義者

綜觀青年時期曾琦成為民族主義者之歷程，簡而言之，起於辛亥，成於五四。其中以1918至1919年，尤為其關鍵，隨着日本侵華逐步昇級以及軍閥政治之腐敗，曾琦對於當前國家危機，不斷流露關注與悲憤。及至1918年「中日軍事協定」事件發生，使其成為留日學生罷學歸國領袖之一，並於同年毅然回國投入京津滬地區反日愛國運動，組織愛國學生團體，抵制日貨，宣傳言論，以及參加五四學運。曾琦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形象，由是確立。

期間曾氏撰寫的《國體與青年》一書，堪稱為五四時期新一代知識青年有關民族主義之代表作，深受時人注目。隨着民初時局之轉移，其時民族主義精神之特徵，已由前此「漢滿對立及排滿」之「辛亥型」轉向「全民性外抗強權」之「五四型」<sup>⑩</sup>。就此而論，《國體與青年》一書之民族主義內容包括有(1)強調國民須具國家觀念之重要性；(2)由於國家主權不斷喪失，我國乃屬一「不完全獨立之國家」；(3)對於日本與列強對華政治、經濟之侵略應奮起對抗，並主張對日訴之武力；(4)我國對於亞洲鄰國應進而有「濟弱扶傾」之道義和責任。可見，其所論與「五四型」民族主義並無二致！

《國體與青年》一書，堪稱為五四時期新一代知識青年有關民族主義之代表作，深受時人注目。其時民族主義精神之特徵，已由前此「漢滿對立及排滿」之「辛亥型」轉向「全民性外抗強權」之「五四型」。

此外，就曾琦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關係作一剖析，可以發現，其一，留日學生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高潮具有密切關係。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留日學生先後策動四次集體罷學歸國，從事反日反帝活動，此即(1)1905年「取締規則」風潮；(2)1911年「留日中國國民會」與「國民軍」活動；(3)1915年抗議「二十一條條約」；(4)1918年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其中1911年及1918年兩次活動均與現代中國兩大愛國運動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之爆發具有極其密切關係，向為史家所定論<sup>⑪</sup>。曾琦為1918年事件中之留日學生領袖，其歷史地位，無庸置疑。

其二，曾琦於1918年前後目睹政局之混亂與腐敗，對於三十歲以上之中、老年群，流露出強烈的不滿。於《國體與青年》一書中，他再三呼籲三十歲以下之覺悟青年奮起，及組合「中堅團體」從事救國，顯示出曾氏已有疏離現有政治力量，另行自組黨團之意念。曾氏於1918年參予創設「少年中國學會」，並於1923年成立「中國青年黨」，終於使現代中國出現國共兩黨以外之救國政治集團，是為第三政治力量之初現。

其三，曾琦《國體與青年》一書，於國體一項，視民主共和之實現為建國之目標。故此民族主義與共和觀念共同提出，此即中國青年黨日後主張「國家主義」及「全民政治」此一「二民主義」之由來。曾氏對於共和政體之實施尤其信念，認為此乃辛亥革命成功以及革命先烈種下之契機，而我國國民性及傳統中國思想均與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其一致性。且書中對於傳統思想與文化多所肯定，五四時期之民族主義者不少對於傳統中國文化抱着對立之態度，進而主張

「全盤西化」，從而產生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困局，曾琦顯然不屬於此一類型之民族主義者。也許我們可以譽曾琦為與孫中山同一類型之「肯定傳統的民族主義者」。

### 註釋

- ①② 沈雲龍：《曾琦(慕韓)先生傳》，頁108，謂兩報均以經濟問題停刊，至於眾議員選舉，複選未見中選，原因不明：關於民國國會選舉，可參張朋園：〈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予——兼論蛻變中的政治優異分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1集，頁37-142。
- ③ 李璜：〈曾慕韓兄已盡到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傳記文學》，29卷2期(1976)，頁14。又〈共禍日彰、思君尤切〉一文中，則謂曾氏內心乃「有意窺探日本圖我之陰謀，以及北洋軍閥與日本勾結之內幕，真所謂『別有用心者』！」
- ④⑧ 曾慕韓先生遺著，頁1,371；頁105。
- ⑤ 心照：〈紀念曾慕韓先生〉，《曾慕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台北：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1981)，頁167-69。
- ⑥⑫⑬ 曾琦：〈歸國感言〉，《國體與青年》(北京少年中國學會，1919)，頁84；頁3；頁105。
- ⑦ 薩孟武：《學生時代》(台北：三民文庫，1969)，頁133。
- ⑨ 李金強：〈中國青年黨人與五四愛國運動之探討1918-1919〉，《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3期(1991)，頁6-8。
- ⑩ 關於梁啟超之民族主義思想，參見楊肅獻：〈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1896-1907〉；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1986)，頁109-29。而章太炎則參湯忠鈞：《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與章太炎》(香港商務，1990)，頁166-95。
- ⑪ 左舜生：〈懷念曾琦〉，《文藝史話及批評》(台北：文星，1966)，頁136。
- ⑭ 〈五四運動北京資料選輯〉，《五四運動文輯》(武漢：湖北人民，1957)，頁165。
- ⑮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80. 周氏對於《國體與青年》一書，僅列書名而已，恐怕亦未見及該書。
- ⑯ 李國祁：〈甲午戰後至抗戰以前我國民族主義的發展〉(1895-1936)，《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0集，頁840-57；陳豐祥：〈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4集，頁379-86。
- ⑰ Chow Tse-tsung, op. cit., pp. 19-25, pp. 33-35.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75)，頁276-311及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24集，頁411-39。又參Kojima Yoshio: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Etō Shinkis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ive Essay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 175-92.

李金強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副會長。著有〈辛亥革命的研究〉、〈新正統學派——中共「建國」以來辛亥革命研究之發展及其變化〉、〈民國史學南移——左舜生生平與香港史學〉、〈中國青年黨人與五四愛國運動關係之探討〉及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s o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Two Important Issues* 等。